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動盪中的改革：
國民黨人的自救言論與戰後中國（1945-1949）

計畫主持人：林能士

計畫編號：NSC 89-2411-H-004-009

2000年10月

動盪中的改革： 國民黨人的自救言論與戰後中國（1945-1949）

- 一、前言
- 二、戰時戰後黨內民主的呼聲
- 三、官僚主義、官僚資本主義
- 四、戰後派系政治與黨內民主
- 五、黨內民主與蔣介石的地位
- 六、兩黨論與威權重建
- 七、結語

一、前言

（一）研究旨趣

國民黨政權在抗戰時期遭逢時艱匪淺，有識之士對於黨的形象及權力基礎的流失至感焦慮，抗戰後期乃紛起抨擊黨政表現，期能力挽黨國於傾圮之際。抗戰勝利後，國民黨面臨的挑戰更甚於前，此中包括對日戰爭所遺留的財經窘況與伴隨其間的人謀不臧，黨與政權的民主化問題亦正式浮上檯面，此外，相對於中共的武裝對峙，國民黨的體質與組織能否有效的給予抗擊？凡此種種，均有待存問。

國民黨在戰後四年所受的內外壓力不減反增，有鑑於此，溫和的黨人或殷殷關切、或苦心建言；激進的同志則猛施抨擊，幾有毀黨再造的絕決心意。這些來自國民黨內部的自救言論，貫穿了戰後四年的動盪時局；事實上，這就意味著，黨內輿論和國內政局互為連結，其間的辯證關係既形成了 1949 年中國大陸的最終變局，也塑造了 1950 年國民黨在台灣實施改造的若干張本。對國民黨遷台以後蛻變為一個所謂「新政黨」的現象感到疑惑的學者來說，他們的解答極可能就存在於戰後四年這一段關鍵的時期。

本計畫所謂的「自救言論」，同時指涉那些分散的——具有差異性、多元性的——個人議論，以及若干集中的——具有功能性、統一性的——政治運動的策略與主張（所謂政治運動，例如黨人發起的「革新運動」，或由總裁蔣介石諭令進行的「黨團統一」等等）。開展於抗戰勝利後不久的革新運動係由 CC 系所主導，該運動的部分綱領代表了多數黨員的共識，例如肅清所謂的派系主義、官僚政治與官僚資本主義；但是部分綱領則引發了日後的路線之爭，例如革命與民主孰為先後的問題。這類路線之爭破壞了作為統一性的政治運動的政治功能，實際上，諸如派系主義等等始終揮之不去的黨內積弊，才是那些原欲摘除黨內積習的政治運動最終被破壞的因素。

無論是分散的個人議論，或是集中的政治運動，這些眾聲喧嘩的自救言論所衍發的改革動力與爭執，繼續延伸至 1950 年的台灣。本計畫即擬以黨事為經，時政為緯，詳盡敘述國民黨人最後的救亡努力，與各股政治暗潮，以見證國民黨的自省能力及政治窘境。對於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改革歷史也將做出適當的評價，並揭示戰後四年國民黨人的自救言論與 1950 年改造方案的內在聯繫關係。

（二）研究背景

本計畫是從以下兩個背景中產生的學術研究構想：第一、國民黨黨史研究漸有斷層之憂；第二、傳統國民黨黨史專著大多忽略了戰後

四年國民黨人的救亡努力。關於第一點，就研究數量與主流價值而言，今日國內的國民黨黨史研究日益趨於邊陲化，此與國內政治、學術環境丕變有關。在這情況下，以往傳統黨史專著所缺所略者，在今日便幾乎難有機會補之詳之。關於戰後四年國民黨人的自救言論就屬於傳統史著所缺所略者。

一般而言，戰後四年黨人自救言論未佔有傳統專著的適當篇幅，這至少出於以下兩點原因：第一、傳統專著（特別是中國大陸出版的國民黨通史著作）將黨史當做一部中國現代政治史書寫，使得黨史的「特殊面」隱沒在國史的「普遍面」之下。基本上，國民黨為當時中國的執政黨，黨史不可能脫逸現代政治史的格局，這之間存在著比重拿捏的難題。在九〇年代的台灣，學者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一書有較令人滿意的處理比例；¹但揆諸中共史學下的國民黨通史作品，特別對於戰後四年的敘事，我們只看到執政黨處理國事的一種「普遍性」書寫，卻幾乎難以發現一個政黨面對空前危機時的「特殊性格」。

第二、傳統專著（特別是台灣在戒嚴時期產生的黨史研究）視戰後四年國民黨的表現為一「禁區」。這大多出於失敗者不願重揭過去的創痛所致。事實上，該創痛具體的牽扯到國民黨內部的積弊與腐敗，以往台灣的史學界並不容易在敏感的政治局勢下進行相關圖像的探索與重建，更遑論試圖分析戰後四年黨人形形色色的自救言論了，因為這些言論正具體指陳了黨內各種的積弊與腐敗。

由於戰後四年黨人的自救言論至今隱沒不彰，人們要嘛認為國民黨面對政權的空前危局時一定欠缺自省能力、無動於衷；要嘛可能會相信，國民黨在當時提出的改革良方必定全盤失敗，不足後人一哂。前者不符歷史事實，自不待言；後者也是誤解，至少也是以 1949 年的成敗做出有欠公允的評斷。事實上，我們從戰後四年黨人的自救言論可以發現，這些眾聲喧嘩的言論的確影響了戰後國民黨的形貌——不論是那些共識極高的內容，或是那些分歧頗大的政見。再者，這些

¹ 參見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共五冊（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94）。

黨內輿論和國內政局互為連結，其間的辯證關係既形成了 1949 年中國大陸的最終變局，也塑造了 1950 年國民黨在台灣實施改造的若干張本。任何對國民黨遷台後的表現感到興趣的學者，如不回頭省視戰後四年這段關鍵的年代，勢必不容易弄清國民黨變化的根由。

（三）研究架構：從「黨內民主」出發

戰後國民黨人自救言論的訴求範圍廣泛，各個訴求點之間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關係。因此將這些訴求點分門別類的單獨論述，事實上並不容易澄清歷史的形貌。有鑑於此，突顯一個主題，並連帶分析該主題與其他主題之間的聯繫關係，會是比較容易著手的論述方向。本計畫以戰後黨內民主的呼聲作為研究主軸，因為它同時涉及黨人其他自救言論（諸如官僚政治、官僚資本主義、派系政治、威權領導、兩黨論）的政治企圖、內容、目的，從這裡著手，也能適當的說明國民黨人自救言論的理想性與其背後的現實考量。

孫中山逝世之後，國民黨內的派系之爭常以「恢復黨內民主」作為爭執焦點。黨內異議者藉著「黨內民主」，其實意欲削弱當權者（通常指的是蔣介石）的統治合法性與道德基礎。1940 年代，國民黨的黨內民主聲浪再起，尤以抗戰勝利後的氣勢為最。和訓政初期的爭執比較，這時的黨內民主訴求者陣營更為廣泛，甚至包括以往協助蔣力抗黨內民主浪潮的子弟兵，如 CC 系、黃埔系等。

根據黨內的輿論，由於黨的民主機制不健全，以致在黨政表現上出現嚴重的寡頭統治，黨意無從反映，而上者執意孤行，下者怠惰卸責，更甚者則結黨營私，腐蝕國本。職是之故，從黨內民主的呼聲著手，人們可以發現國民黨的諸多具有連帶關係的缺失與弊端。此外，爭取黨內民主之舉也是黨內政治資源分配不公的產物，因此探討有關黨內民主的呼聲及其連帶的揭弊言論，也有助於人們了解戰後國民黨人自救言論背後蘊含的利益爭執；如果忽視這一點，那麼人們就很容易誤認這些自救言論純粹出於理想光環，這樣片面的認識，將無從說

明戰後改革言論的缺陷，以及最終國民黨在 1949 年退出中國大陸的真正原因。

二、戰時戰後黨內民主的呼聲

對日抗戰時期，國民黨政權曾因民族主義的情緒，短暫的取得民眾的支持。但這個獨大的執政黨在創造一套完整統一的政治制度方面卻不曾成功，行政機構依然是缺乏效率和腐敗的，政府也未能妥善的處理農村問題，而且政府一直沒有全面回應要求政治參與的輿論壓力。²尤有甚者，黨的幹部也和昔日革命年代的犧牲進取精神愈行愈遠，這使得蔣介石深感憂慮。1938 年，正值抗戰軍興之際，蔣介石向他的黨人發出嚴厲的警告：

我請各位嚴重注意，我們的黨差不多已成為一個空的軀殼而沒有實質了，黨的形式雖然存在，但黨的精神差不多是完全消失了！……我說這句話，心裡很悲痛，很難過，但是現在的情形，我們革命不但是遇到挫折，而且差不多快要失敗，本黨不但達到艱難而快要消失了，此時不說，將更沒有說的機會，我們此時不懺悔，將更沒有懺悔的機會。現在黨外的人對於本黨的現狀和前途，都看得洞若觀火，有的替我們嘆息，有的替我們著急，我們自己若還諱莫如深，因循過去，怎麼對得起我們的總理和先烈，怎樣對得起我們的國家和痛苦的同胞，……。³

根據蔣介石的看法，國民黨與國民黨人犯了組織鬆懈、紀律廢弛、團體意識薄弱等項的致命毛病，解決之道在於嚴密組織、提振革命精神。

² Lloyd E. Eastman,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 Press, 1975), p. VIII.

³ 〈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開會詞〉，《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紀錄》，1938 年，頁 103。

⁴但是蔣介石這種由上而下的針貶角度並不符合一般黨員的看法。事實上，國民黨人對於黨的「現狀和前途」，不僅不像蔣所抨擊的那樣「諱莫如深」，而且反倒是討論熱烈。觀察這些黨內輿論的內容可以發現，蔣提出的種種黨的毛病仍舊過於表象，蔣忽視了毛病的背後才是問題的根源。

國民黨政權伴隨著抗日戰爭而愈發明顯的無能與腐化，讓部分黨人對於民心背離的趨勢有所警覺。黨內成員私下論及時局，感慨者有之，鬱憤者亦不乏人。這樣的反應，與外界抨擊國民黨的態度之間，並無太大的距離。⁵在重慶，即使在若干重要的內部會議上，黨內高級幹部也毫不掩飾他們的焦慮之情，認為改革之機，迫在眉睫。戰時任職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的復興社成員唐縱就曾在日記中記載如下：

各方有志青年，咸不滿現狀。抗戰結束，政府如勇敢接受人民不滿之情緒而加以強烈之改革，則人心歸於一統，而天下定，否則必有分裂而發生劇烈之變動。余姑志之，余相信此言不謬也。⁶

國民黨表現不孚眾望，無從振作，黨人時有微詞。唐縱指出「目前的黨，是發牢騷的集團，既無權又無能」，形容頗能中的。⁷一些人嘗試為國民黨找出病根，其中尤以黨內民主不足，似乎是黨員無權無能的重要病源。這些看法與訓政初期的黨內民主呼聲之間，並無太大的差異。也就是說，由於國民黨欠缺民主機制，致使官僚政客、土豪劣紳得免透過民主程序，即能輕易的混入黨內；又因為黨欠缺民主機制，使得這干人等得以規避責任政治的規範，造成黨的腐化。

⁴ 同前註，頁 104-107。

⁵ 參見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頁 720-731；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北京：群眾出版社，1992），1944 年 10 月 5 日，頁 463，以下簡稱《唐縱日記》；John K. Fairbank,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pp. 241-264.

⁶ 《唐縱日記》，1944 年 2 月 22 日，頁 414。

⁷ 《唐縱日記》，1945 年 4 月 8 日，頁 501。

循著這類的觀點，立法院長孫科在 1944 年 2 月發表的一篇半公開性質演講，以其直言不諱的內容，博得了黨內高級幹部在戰時的視線與同情。在這篇向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學員發表的談話當中，孫科延續他在 1930 年代以來標舉憲政價值的立場，力倡戰後中國勢須走上民權主義、主權在民的道路，並強調國民黨內部的民主化將是扭轉國內政治氣象的前提。過去二十年裡，黨的組織由上而下，省市委員率經中央指派，全代會代表多由圈定。因此，孫科指陳黨內只是做到集權，卻忘了民主的意義和方法。這和孫科所理解 1924 年所揭櫫的民主集權制一本由下而上的精神，顯然背道而馳；於是孫科認為，總理孫中山的遺教並未確實的被其黨人所遵行。⁸

對於那些自恃有幾十年光榮的革命歷史，便想著永遠佔據執政黨地位的貪婪心理，孫科毫不遮掩地向在場聽講的黨政幹部表達了他的憂慮。這位立法院長認為國民黨「背棄了民主的精神」，「使革命黨的作風變成了官僚集團的作風」。孫科並警告：「大凡一個黨，或者是政治上的一個勢力，一旦大權在握，如果不能保持民主的態度，自成了統治階級，便會變為革命的對象。」⁹

孫科的言論獲得不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的歡迎與附和，以致黨的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必須再接再踵而來的五屆十二中全會上，針對這股要求「黨內民主」的內部輿論，表明他的個人立場。¹⁰值得注意的是，蔣介石正是以孫科所稱「數十年光榮的革命歷史」，告誡同志勿忘了國民黨一頁頁茹苦飲痛的奮鬥史。蔣介石並不認為國民黨無心實行民主，不過他提醒：「我們所要建立的是有法紀有秩序的民主，而不是無法紀無秩序的陷於無政府狀態的假民主。」對於那些議論民主問題

⁸ 孫科，〈政治民主化，經濟計劃化〉，1944 年 2 月 23 日在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第三十期演講，孫科，《孫科文集》，第 3 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0），頁 1157。

⁹ 同上文，頁 1157-1158。

¹⁰ 《唐縱日記》，1944 年 4 月 13-14 日，25 日，5 月 18 日，頁 424，426，431。

的黨內民主同志，蔣介石要求他們發揚互信和共信，對外言論要格外慎重，「切莫授人以隙，而使本黨革命受了無形的損失」。¹¹

蔣介石習慣以道德性的語言制止國民黨人的內部爭吵。然而孫科的言論並非孤立的個案，他的呼聲在戰後被更多的黨人承繼下來，這顯示蔣先前的道德性勸說無法真正平息黨內浮動的情緒。一些人繼續抨擊稱，黨執政之後，民主集權制就被個人領導所取代，從此，黨的幹部不再透過選舉產生，而是讓黨的上級任命。由於領導階層的推諉卸責、漫不經心，使得黨在縣級以下的基層單位萎縮了，黨的會議徒具形式，黨員消極怠惰。因此，黨沒有社會基礎，甚至在自己的黨員之中也缺乏基礎。¹²

不少黨人認為，只有透過、並實踐他們的呼籲——實行黨內民主——國民黨才能真正鞏固其統治的道德基礎，也才能如蔣介石所期望的使革命免於遭受損失。持有這類立場的黨員相當的普遍，以致在國民黨形象日蹙的局面下，黨內民主似乎在檯面上成了黨人的一種普遍性信仰，甚至在黨的官方文件當中也能見諸這股熱潮。

1945年以降的國民黨全代會與中全會上，民主的原則一再被黨的高級幹部提出，並且體現於多件向外界公開發表的決議案當中。例如1945年國民黨六全大會——一個以抨擊黨的無能腐化而聞名的全代會——對於黨務報告的決議案，便直指黨務的主要缺失，認為「黨內民主」這個環節出了毛病：

年來黨務之主要缺點，在黨的民主精神不足，以致黨與黨員脫節，黨員與民眾脫節，馴至官僚主義侵入革命陣營中。今後各級代表大會必須按時舉行，各級負責幹部必須依法選舉，下級應服從上級之命令，上級亦應重視下級之意見。同時黨內應倡

¹¹ 蔣中正，〈本黨革命歷史的特徵和一貫的信心〉，1944年5月20日出席五屆十二中全會開會講詞，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4），卷20，頁389-393。

¹² Lloyd E. 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 Press, 1984), pp. 120-121.

導相互批評，而各級同志亦當互相尊重，以肅清官僚主義之作風，鞏固全黨之團結。¹³

1946年六屆二中全會則對於民主集權制再行闡發。¹⁴至於1947年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的一件決議案，更對黨的頹勢發出最沉痛的警告。三中全會這件措詞嚴厲的〈現階段的黨務方針案〉力言：「黨的病狀，確已陷於積重難返之勢，非一人一事一時一地之改革所能為力。必須從根本上著眼，為全面之更張，大刀闊斧，由外及內，總檢討，大革新。」根據案文的檢討，國民黨「從來重集權而輕民主，重人治而輕法治，重黨部而輕黨員」，這種「畸形風氣」應該徹底改正，此後「一切重大決策，必須通過會議，一切重大用人，應該信任制度。」決議案接著要求黨人，「要以理想改造現實，勿以現實犧牲理想」，「必須肅清官僚主義，發揚革命作風，實行民主作風」。¹⁵（附表）

附表：國民黨在1945年後提及「黨內民主」的決議案（中央層級）相關內容

	案名	相關內容
六全大會 1945.5.19 通過	對於黨務報告之決議案	……一、年來黨務之主要缺點，在黨的民主精神不足，以致黨與黨員脫節，黨員與民眾脫節，馴至官僚主義侵入革命陣營中。今後各級代表大會必須按時舉行，各級負責幹部必須依法選舉，下級應服從上級之命令，上級亦應重視下級之意見。同時黨內應倡導相互批評，而各級同志亦當互相尊重，以肅清官僚主義之作風，鞏固全黨之團結。……

¹³ 〈對於黨務報告之決議案〉，1945年5月19日六全大會通過，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6），頁919。

¹⁴ 〈對於黨務報告之決議案〉，1946年3月15日六屆二中全會通過，《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頁1038-1039。

¹⁵ 〈現階段的黨務方針案〉，1947年3月23日通過，秦孝儀主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輯，《中國國民黨歷屆歷次中全會重要決議案彙編（二）》（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79），頁441，444-445。

六屆二中全會 1946.3.15 通過	對於黨務 報告之決 議案	<p>……二、實行民主集權制</p> <p>(1)各級代表大會，均應照章如期舉行，所有代表必須由選舉產生，不得指派或圈定。</p> <p>(2)未經選舉而成立之黨部，均應於本年內盡速依法完成選舉，成立正式黨部。</p> <p>(3)中央重要決策，應先經中央常會商討決定後呈總裁核定。</p> <p>(4)總裁對重大問題之指示，先交中央常會研議實施。</p> <p>(5)各級黨部之重要事項，應經各該執行委員會之決議。</p> <p>(6)上級黨部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有重大決策時，應先徵詢下級黨部之意見；遇有緊急措施未及徵詢時，一經決定，應即通知各級黨部，以達全體黨員。</p> <p>(7)黨員在黨內有充分發表意見之自由，但一經決議，應絕對服從。</p> <p>……</p>
六屆三中全會 1947.3.23 通過	現階段的 黨務方針	<p>……以民主的方法透過合法的組織，造成黨的意志，……厲行選舉制度，人才主義，……黨的工作方式，無論在組織、訓練、宣傳、民運等方面，必須肅清官僚主義，發揚革命作風，厲行民主作風，從來重集權而輕民主，重人治而輕法治，重黨部而輕黨員之畸形風氣，應徹底改正。一切重大決策，必須通過會議，一切重大用人，應該信任制度。注意黨內輿論，積極團結黨員。凡未經會議通過者，不能視為黨的主張。……</p>
六屆四中全會 1947.9.12 通過	中國國民 黨當前組 織綱領	<p>……依據本黨民主集權制之原則，各級領導幹部應由民主之方式選舉，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總裁領導全黨，下級服從上級；各級機構應經常向黨員提出工作報告，黨員應切實檢討工作，坦白互相批評。……</p>

資料來源：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冊，頁 919，1038-1039，1109-1110，1172。